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一二·一运动



7
266.51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3475113

97
K266.51
2
2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一二·一运动

武 军 编著

目 录

一、山雨欲来风满楼	(1)
二、枪炮声中的反内战集会	(10)
三、民国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19)
四、四个人倒下去，四万万人站起来	(26)
五、第二条战线的发轫	(40)

一、山雨欲来风满楼

美丽富饶的云南位于祖国的西南边陲(chuí)。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国民党政府推行片面抗战路线,断送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云南成为坚持抗战的重要后方。大批工厂、机关、学校迁到昆明,使一向文化落后的昆明,成为人文荟萃的地方。到1945年,昆明市共有4所大专院校,41所普通中学和中等专科学校,在校学生达3万多人。其中,由北平、天津南迁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或联大),更集中了国内外一流学者和大批优秀青年。北大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摇篮;清华是“一二·九”运动的先锋;南开则是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中坚。它们不仅带去了北大的学术自由风气,清华的求实精神,南开的民主作风,而且还带去了“五·四”、“一二·九”的革命传统。在南迁途中,有250名学生和闻一多教授拒绝国民党当局的安排,组织湘黔滇旅行团徒步旅行,经过68天,行程3300多里,从湖南长沙步行到了昆明。步行的师生沿途亲身接触各地风土民情,亲眼看到各地的民生疾苦,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现实生活教育,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加深了认识,也经受了锻炼,培养了艰苦精神和互助风气。西南联大的迁入,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进步教授和青年学生云集昆明,给古老的春城带来了蓬勃生气,为爱国民主运动的开展准备了肥沃的土壤。

中共南方局和中共云南省工委十分重视对昆明爱国民主运动的指导。联大在昆明成立不久,中共南方局就派王亚文建

立了联大党组织,后又任袁永熙为支部书记。到1940年,联大共产党员发展到83人,占云南全省党员总数的1/3,是当时云南省党员人员最多、最集中、力量最强的地下党组织,受中共南方局和云南省工委直接领导。在地下党领导下,还建立了一批外国组织,如云南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抗先)、群社、民众歌咏团等,作为党团结进步青年学生的纽带。党组织不断从中吸收新鲜血液,把够条件的进步分子吸收入党。

云南自辛亥革命后一直由地方势力控制。1927年,出身于彝族土司家庭的龙云取得了云南的统治权。龙云表面上服从国民党南京政府,实际上独掌云南的军政财经大权,保持着相对独立的状态,是云南地方实力派的首领。抗日战争开始后,国民党统治的重心转移到西南地区,云南成为国民党政府取得外援物资的主要通道。鉴于云南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蒋介石加强了控制云南的活动,与龙云的矛盾日益加深和激化。中国共产党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通过各种渠道,对龙云做了大量的争取团结工作。1937年7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时,周恩来曾和龙云进行过面谈,朱德、叶剑英也以和龙云为云南讲武堂同学的身分对龙云做工作,鼓励他积极抗战。后来,中共南方局特派华岗、周新民等到昆明对龙云进行统战工作,并在龙云主持的滇黔绥靖公署内设立了与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直接联络的电台。在中共帮助下,龙云的政治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为了取得民主进步力量的支持,加强对抗蒋介石的力量,龙云对各种进步力量在云南开展的爱国民主运动,采取了比较开明的同情和支持态度。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统治区一片白色恐怖,军统副局

长、特务头子康泽专程到昆明，要求逮捕联大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龙云进行了抵制，并暗中把消息透露给地下党，使暴露的进步学生得以安全撤离。龙云的开明立场，对昆明爱国民主运动的开展是一个有利的因素。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把政策重点由抗日转向反共反人民，从1939年至1943年，连续发动3次反共高潮，除频繁袭击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外，还在国统区逮捕、杀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实行高压政策。为了避免无谓的损失，中共云南省工委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在国统区实行“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和南方局指示，把昆明各学校比较暴露的党员和进步学生转移到外地工作，其中西南联大疏散下去的约100人。留下的骨干也转而采取分散的、小型的、生活性的方式进行活动。因而这时期昆明的学生运动显得比较沉寂。但是，广大学生饱受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迫害，生活也异常艰难，对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和腐败现象是极为不满的，一有机会，就要起来反对。1941年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很快占领香港。香港沦陷前，许多文化界名流、社会活动家和政府官员无法撤出，而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却垄断民用飞机，抢运私产，甚至他的几只洋狗也坐飞机飞到了重庆。这条消息在大后方报纸上披露后，立即引起各界人士的愤慨。在联大，历史系吴晗教授在课堂上感慨地说：“南宋亡国时有个‘蟋蟀宰相’（指贾似道），今天有个‘飞狗院长’，可以媲美。”联大学生很快地自发组织起来，开展“倒孔”运动。1942年1月6日，由联大学生发起，云南大学，中法大学和一些中学学生响应，举行了3000多人参

加的讨孔示威游行。学生们在大街上高喊“争取民主自由!”“打倒发国难财的孔祥熙!”等口号,并通过决议,要求国民党政府对孔祥熙进行制裁。这是皖南事变后昆明学生举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在大后方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1944年,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转入大反攻。在中国解放区战场上,八路军、新四军也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局部反攻。但国民党战场的情况却截然相反,在豫湘桂战役中,国民党军队出现抗战开始以来的第二次大溃败,使西南后方直接受到日本进攻的威胁,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为了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全国人民迫切要求改组国民党政府,实行宪政。1944年9月,中共代表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重新活跃起来,迅速掀起了一次新的争取民主的高潮。新高潮的起点是1944年昆明西南联大的“五四”纪念会。

1944年初,国民党政府因恐惧“五四”精神的巨大政治影响,将青年节改到3月29日黄花岗起义纪念日,引起进步人士的愤慨。根据中共云南省工委指示,联大党组织决定以热烈庆祝“五四”来回敬蒋介石。5月3日晚上,联大历史学会召开“五四”纪念座谈会,邀请许多教授出席,其中有闻名大后方的民主战士闻一多和吴晗。座谈会场只能容纳300多人,许多学生就冒雨站在窗外听。会上尽管有不同观念的交锋,但要求民主成为压倒一切的呼声。5月8日晚,联大中文系在图书馆前大草坪举办了一个规模更大的演讲会,参加的人达3000以上,昆明其它院校学生和社会各阶层人士也前去参加。这两次

集会表现了广大师生强烈的爱国精神和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的义愤,是争民主争自由的集会,被联大学生称为“民主精神复兴的一天”。

1944年7月7日,昆明4所高校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和英语专科学校联合举行纪念“七七”的时事晚会,到会的昆明各界青年达2000人以上,会议冲破了国民党当局“只谈学术”的禁令,热烈讨论当前的政治问题,抨击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这次集会加强了昆明各校学生之间的联系。

1944年秋,随着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的溃败,日军侵入贵州独山,使云南受到威胁。广大人民对国民党政府抗战不力和腐败无能更加不满,要求改革政治的情绪更加强烈。中共云南省工委和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云南支部共同发起,并得到龙云的默许,在10月10日“双十节”这天以昆明各界名义举行群众大会,由罗隆基、闻一多、李公朴、楚图南、吴晗等人发表演讲。尽管国民党省、市党部发出通知,禁止学生、工人参加集会,到会的学生和群众仍有5000多人。集会进行中,国民党特务在人群中燃放爆竹,一度引起了混乱。但从事破坏活动的特务很快被群众揪出会场,阴谋未能得逞。会议最后通过宣言,要求国民党政府切实保障人民的各项自由,立即释放政治犯,彻底改革财经政策,减轻平民痛苦,提高士兵待遇,普遍平均分配全国军队装备与供应。会后进行了大游行。这次集会在国统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重庆、成都、贵阳等地也都纷纷举行集会。民主运动在大后方迅速展开。

12月25日,是云南护国起义纪念日。这一天,昆明4所高校的学生自治组织联合发起召开昆明文化界纪念护国起义

大会,参加者有护国元老、学生、文教界人士、工人、机关公务员、滇军军官、职业青年、市民等共 6000 多人。会议通过对窃国大盗袁世凯的痛斥,表达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抗议。会议通过的宣言列举大量的事实,抨击国民党统治的腐败,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训政,组织联合政府。会后,在地方当局默许下,举行了盛大的游行示威。这次活动除了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蒋介石以外,还公开响应中共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引起国民党政府的很大震动。它说明昆明民主运动正以一浪高过一浪的势头向前发展。

随着学生运动的高涨,皖南事变后因进步学生大批转移和隐蔽而被三青团夺去的昆明各校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又被进步学生夺了回来。1944 年秋,联大学生自治会进行改选,进步学生占了大多数。云大则在 1943 年就建立了由进步学生掌握的学生自治会。昆明其他一些大中学校的学生自治会也在这一时期大量转入进步学生手中。国民党的御用青年组织三青团在学生中不得人心,日益孤立。

昆明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迅猛发展的突出标志,是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和昆明学联的成立。隐蔽埋伏时期,进步学生的主要活动阵地是一个个小型的秘密读书会 and 社团,比较分散,互不联系。在民主运动出现高潮的形势面前,进步学生要求进一步组织起来,中共地下党组织也需要有强有力的助手,以便更广泛地团结群众。这时,中共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发出号召:把爱国青年的核心组织建立起来!在中共云南省工委关怀下,1945 年 2 月,民青第一支部在联大建立,这是一个秘密的先进青年组织,其章程规定接受最先进政党(指共

产党)领导,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不久,又成立了民青第二支部、第三支部。民青是中共的外围组织,受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直接领导。民青建立后发展很快,到“一二·一”运动前夕,已有盟员 300 多人。民青的建立,使地下党有了联系广大学生的纽带,有了直接领导和掌握各种学生团体的坚强骨干,它的成员在“一二·一”运动中充分发挥了先锋和模范作用。

1945 年“五四”青年节,昆明 4 所高校学生自治会联合举办纪念周,以扩大民主运动的影响。国民党当局得知后,惶恐不安。国民党中央党部密令云南地方当局和昆明各学校校长严加防范;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严令昆明各报不准登载有关纪念“五四”活动的消息;联大当局贴出布告,免费招待全校学生看戏。但这一切都未奏效,“五四”纪念周活动按计划顺利进行。5 月 4 日,昆明市的爱国青年举行了抗战开始以来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盛大游行,同一天,全体学生通过了成立昆明学生联合会的决议。5 月 26 日,昆明学联正式成立,联大学生、中共党员齐亮当选为学联主席。这是当时国统区的第一个全市性学联组织,为昆明市学生统一步调,统一行动,提供了公开合法的领导条件。

以学生为主体的昆明爱国民主运动,得到了进步教授的大力支持。西南联大的教授多是国内外知名的一流专家学者,社会地位很高。但在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他们的生活却每况愈下。曾昭抡教授的鞋子常常前后见天,吴大猷(yóu)教授上课穿着打着大补丁的裤子,华罗庚教授住在牛棚里,闻一多教授到中学兼课仍不能维持生活,只好对外挂牌刻图章,吴晗教授为给夫人治病,不得不忍痛贱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连联

大常委，清华校长梅贻琦的夫人也要做米糕送到商店寄售以补贴家用。大多数教授生活窘困，贫病交加。因而，他们对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贪污腐败表示强烈不满，同情并支持学生的民主运动，有的甚至站在民主运动的最前列，在激烈复杂的斗争中锻炼成为坚强的民主战士，如闻一多、吴晗等人。1943年5月，在中共帮助下，中国民主同盟云南支部在昆明成立，闻一多、吴晗、潘光旦、曾昭抡、费孝通、潘大逵等著名教授都参加了民盟。由于这些教授的特殊身分，他们在社会上、在学生中都有较强的号召力、影响力，学校当局和地方当局对他们也比较尊重。进步教授们起到了学生无法起到的特殊作用。

昆明的以学生为主体的民主力量，在云南特殊的政治条件下，在中共的正确领导下，经过长期的积蓄，特别是经过1944年至1945年间的迅猛发展，到抗战胜利前夕，得到了空前壮大，成为国统区民主运动的一支排头兵、生力军。昆明，特别是西南联大，被人们誉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

以昆明为中心的云南爱国民主力量日益壮大，使蒋介石如坐针毡。龙云对爱国民主运动的同情和支持，更使蒋介石难以容忍。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了放手推行独裁内战政策，巩固后方，决心除掉龙云这个心腹之患，并进而扑灭昆明的民主运动。蒋介石借受降之机，精心设下调虎离山、釜底抽薪之计。他假装好意，让龙云的滇军到越南接受日军投降。龙云不知是计，果然派卢汉率滇军主力赴越受降。蒋介石趁机派自己的嫡系部队控制了昆明，并在滇越边境布置优势兵力，对卢汉进行监视。部署完毕后，蒋介石仍不放心，亲自坐镇西昌，遥控指挥

解决龙云的行动。1945年10月3日,蒋介石的嫡系将领、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指挥国民党中央军第五军(军长邱清泉)、宪兵十三团和机场守备部队,在昆明发动军事政变,强迫龙云离开云南,结束了龙云对云南长达18年之久的统治。

蒋介石在解决龙云以后,任命另一位滇系将领卢汉继任云南省政府主席,并将杜聿明调离云南,由其另一位心腹大将关麟征担任云南警备总司令,以平息众怒,笼络人心。实际上,这只是个幌子。因卢汉当时在越南受降未归,蒋介石便让国民党党棍,CC骨干李宗黄代理省主席。李宗黄虽是云南人,但在云南名声很臭,因为1927年他曾被蒋介石派到云南“清党”,滥杀无辜,被云南人民赶走。他和共产党人,进步人士之间有不共戴天的仇恨。蒋介石派他回云南前,曾5次召见他,面授机宜,要求他务必消灭云南的所谓“三害”(指民主堡垒、学生运动和地方军政系统)。显然,蒋介石派李宗黄、关麟征到云南,并委以重任,是想利用这些忠实的鹰犬直接控制云南,扑灭民主运动的熊熊烈火。

李宗黄、关麟征一到云南,便和邱清泉等人狼狈为奸,对云南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他们自恃掌握了云南党、政、军大权,又有蒋介石撑腰,决心对云南的爱国民主力量开刀;而已经发展壮大、拥有了雄厚群众基础的民主力量也决不甘屈服于反动派的屠刀之下。这样,反动派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空前地尖锐和激化了,一场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之间的短兵相接的较量不可避免地将要展开了。

二、枪炮声中的反内战集会

1945年8月，中国人民历经8年的千辛万苦，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终于盼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抗日战争结束后，全国人民无不渴望休养生息，重建家园，从此过上和平幸福的生活。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建国方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不避艰险，亲自赴重庆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经过43天的不懈努力，迫使国民党政府同意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签订了《双十协定》并公布于众。

但是，写着“坚决避免内战”的《双十协定》公布的第二天，1945年10月13日，蒋介石就对其部下颁发了“剿匪密令”，命令各战区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与此同时，大量印发10年内战时期蒋介石亲自拟订的《剿匪手本》，用飞机运到前线的国民党军人手里。11月，蒋介石在重庆召开军事会议，确定了“剿共第一”的基本方针，制定了6个月内击溃共军主力，然后分区“清剿”的军事计划。于是，国民党军队在日伪军配合下大举出动，扑向解放区。到11月，蒋介石共调动了13个战区的56个军，加上日伪军，总共200万军队向解放区进攻。饱尝战乱之苦的中国人民又重新陷入了内战的血海之中。

内战的消息震动了全国人民，给人民带来了忧虑、恐惧和愤慨。联大历史系教授吴晗在《时代评论》上发表的文章说出了人民的心里话：“8年抗战，人民的汗流干了，血流尽了，钱被榨完了，田园荒芜，庐舍为墟，农村破产，都市萧条，粮食缺

乏，交通困难，饥荒遍地，盗匪横行，物价高涨，教育停顿，国家已到了危险的关头，休养生息尚且来不及，怎么能再来一场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大破坏？人民群众从心底里反对内战，要求和平。”

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中国青年，在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再次遭到厄运的时刻，又一次站到了斗争的前列。抗战时期大后方民主堡垒——昆明的学生们，首先挺身而出。

内战的狼烟刚刚燃起，西南联大的师生已经闻到了这股烟味。9月3日，日本法西斯无条件投降签字，联大举行“从胜利到和平”联欢晚会，围绕反内战主题，表演文娱节目。会上，闻一多教授发表演说，大声警告国民党好战分子：人民不要内战，人民不要独裁；人民要民主，要和平；谁不要人民，人民就不要谁。11月1日是联大在昆明最后一次校庆纪念日。当天的进步壁报几乎都出了反内战的专刊。《学与作》壁报上写道：我们应当一致起来制止内战，遏止反人民的逆流。《生活》壁报上写道：反对内战，人民流血换来的胜利不是用来哺养内战的！联大民主墙上贴满了各种反对内战的文章。

11月5日，毛泽东以中共发言人的名义发出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这一号召，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广泛响应。11月19日，重庆各界人士成立“陪都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并号召各地建立类似组织，然后成立全国反内战联合会，动员全国同胞参加，以制止内战。11月21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国民党统治区的同胞起来响应重庆反内战联合会所发起的运动。

在昆明，中共地下党员、民青盟员和许多进步学生看了

《新华日报》和听了延安广播后，反映强烈。中共云南省工委认为，应以行动响应党中央关于制止内战的号召。11月22日，省工委负责人同西南联大党组织研究后，决定通过党员和民青做工作，由4所大学学生自治会联合举办一次反内战时事晚会，反对内战，呼吁和平。接着，联大、云大、中法、英专4校学生自治会举行联席会议，决定25日晚在云大至公堂联合召开时事晚会。昆明的几家报纸报道了这一消息。

李宗黄等人得知学生将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的消息后，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制止集会。11月24日晚，李宗黄、关麟征、邱清泉召开党政军紧急治安联席会议，决定：“凡各团体学校一切集会或游行，若未经本省党政军机关核准，一律严予禁止。”25日，报纸上公布了这个禁令。这天上午，李宗黄还召集昆明各大学负责人开会，要求他们务必制止学生集会。联大和云大负责人当场委婉说明，过去常有这样的集会，从未发生事端。但李宗黄等人一意孤行，根本不听劝告。李宗黄向云大校长熊庆来施加压力，不许把学校礼堂借给学生开会。迫于李宗黄的压力，云大当局贴出通告说，学校礼堂（至公堂）暂停使用。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中共地下党通过民青建议把晚会地点改在联大草坪，被学生们接受。开会前，联大当局接到国民党军政当局要求禁止这次集会的公文，但联大当局认为校内集会属于正常，没有加以干涉。

11月25日晚7时左右，在冲破了国民党当局设置的种种障碍以后，反内战时事晚会在联大新校舍图书馆前的草坪上如期举行。参加集会的有各校师生、青年职工、社会人士共6000多人。周新民、尚钺(yuè)、吴晗、闻一多等教授出席了晚

会。联大政治系教授钱端升第一个发表演讲，题目是《对目前中国政治应有的认识》。钱先生以国民党员和参政员的身分，极力强调当前成立联合政府的必要，大声疾呼“内战必然毁灭中国，我们需要联合政府！”

钱先生演讲还没有完，联大新校舍东边围墙外突然响起了机关枪、步枪和小钢炮声，紧接着西边围墙外也响起了枪声。由于事起突然，会场上一度出现混乱。但是大家很快就意识到这是国民党军警故意骚扰破坏，因而会场很快恢复了平静。

第二个演讲者是联大经济系教授伍启元，题目是《财政经济与内战关系》。他认为，要挽救中国的财政经济危机，要实现工业现代化，就必须制止内战，成立联合政府。

在伍先生演说时，墙外手枪、机关枪、手榴弹声再次响起，但他丝毫不为所动，照常演讲，而听众也处之泰然，没有出现惊慌。

国民党特务看到鸣枪、放炮不能阻止晚会继续进行，又使出了新的花招。8时20分左右，特务切断了电源，会场顿时一片漆黑。但晚会组织者早有准备，立即点亮事先准备好的汽灯，晚会继续进行。

第三位演讲者是费孝通教授，演讲题目是《中国内战与美国》。费先生认为，美国目前的对华政策实有助长中国内战的嫌疑，但是，责任不在美国人民，而在美国的财阀和军阀，他呼吁中美两国人民联合起来制止中国内战。费先生演讲途中，反动军警不断向会场上空射击，流弹呼啸着从人们头上飞过。费先生被反动派的卑劣行径激怒了，他激昂地表示：“不但在黑

夜中我们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是要呼吁和平！”费先生的话引起全场的强烈共鸣，大家高声齐呼：“用我们的声音来反抗枪声！”并对费先生的演讲报以热烈的掌声。晚会的气氛进入高潮。

费先生演讲结束后，联大、云大 12 个学生团体的代表向大会宣读建议书，要求大会通过反对内战宣言，被大会鼓掌通过。

这时，一个自称是“老百姓”、姓“王”的中年男子，强行要求上台发言。大会主持人劝阻无效，只好临时改变会议程序，让他先讲。他一上台就声嘶力竭地叫嚷：“中国的内战，不是内战，是内乱！……”他的话还未说完，就被愤怒的群众打断了。几千人异口同声地喊道：“把他轰下台，撵出会场去！”这人一见形势不妙，不敢再讲下去，连滚带跳地窜下台去。这时，大会主持人根据群众揭发，当众揭穿这个自称是“王老百姓”者的真实身分是国民党云南省党部调查统计室主任、中统特务头目查宗藩。

原来，时事晚会召开前，查宗藩奉命率领一批特务潜入会场进行破坏活动。出发前，关麟征以国民党中央委员、云南警备总司令的身分指示他们，如果任务不能完成，就应自杀以谢党国。但是，由于学生们把会场布置得很严密，群众情绪热烈，特务们不敢轻举妄动。查宗藩害怕回去交不了帐，只好硬着头皮上台，没想到一上台就露出原形。从此，“王老百姓”在昆明人民口中成了国民党特务的代名词。

晚会最后一位演讲人是云大潘大逵教授，讲题是《如何制止内战》。潘先生是民盟盟员，他在讲演中极力强调，尽快召开

政治会议，建立联合政府，撤退在华外国军队，是制止内战的主要条件。

潘先生的讲演结束时，已经将近晚上9点钟了。墙外的枪声，手榴弹爆炸声，一阵紧似一阵。显然，这是国民党当局有计划的破坏活动。坐在主席台上的教授们担心学生的安全，建议提前结束大会，被大会主持人接受。学生们唱着《我们反对这个》的反内战歌曲排队离开会场。

不料，学生们走出联大校门后，发现国民党军队已在联大对面的城墙缺口，大西门等处架设机关枪，封锁了道路。几千人在寒风中静坐到深夜，才抄小路进城回家。

学生在校园内举行呼吁和平、反对内战的集会，竟然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并以开枪开炮的手段相威胁，这是对于人民应享有的基本权利的最粗暴的践踏。时事晚会结束后，许多学生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慨，立即自发地酝酿罢课。11月26日早晨，昆明国民党《中央日报》以《西郊匪警，黑夜枪声》为题刊登了一条歪曲事实的消息：

〔中央社讯〕本市西门外白泥坡附近，昨晚7时许，发生匪警，当地驻军据报后，即赶往捉捕，匪徒竟一面鸣枪，一面向黑暗中逃窜而散。

学生们看到这条消息，愤怒的情绪顿时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西门外”正是昨晚开会的西南联大，“7时许”正是昨晚开会的时间，学生在校园内举行正当的集会，竟被诬蔑为“匪警”，几千名学生被诬蔑为“匪徒”，真是岂有此理！总罢课很快地成为学生们的一致要求。这条消息是国民党云南警备总司令部编造的，关麟征亲自过目，并指派少将处长宋文彬送到通